

魏 杰 集

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

ZHONGQINGNIAN

XUEZHENGWENKU

●KAIFANGCONGSH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魏 杰 集

魏 杰 著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95 年 · 哈 尔 滨

(黑)新登字第 5 号

魏 杰 集

WEI JIE JI

魏 杰 著

责任编辑:张佳莉

封面设计:安 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9·字数 440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16-2853-8/F·128 定价:19.80 元

自述：人生与学问

(一)

我 1952 年 10 月出生于距西安市 30 里地的一个名叫西江渡的小村子里。记事后听我父亲讲,我的祖籍在山东省烟台市,是一个世医家庭,颇有声望。但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却日益破落下来,原因是我爷爷是个瘾君子,医道虽好,但收入难以支付高昂的大烟费用。后来我爷爷在给一个国民党的官太太治病时,不慎发生了医疗事故,责任虽不全在我爷爷身上,但国民党的这个大官权重压人,我爷爷只好背井离乡逃到了西安市西边的西江渡村。正因为家庭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变迁,因而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就断了医生的香火,成为地道的农民。我父亲从未上过学,7 岁开始就为别人放牛打零工,12 岁成为富人的长工。我父亲天资甚好,虽未上过学,但在帮我爷爷炮制药的过程中,竟记下了我家祖辈的一些秘方,解放后还用这些秘方治过一些顽症。

我的出生地虽然距古城西安仅 30 里地,但却极为贫穷。我 6 岁上学时,小学设在一个破旧的神庙里,教室既无桌子又无凳子,每个学生自带凳子,并且由每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用土坯垒成一个小土桌。教室四面透风,下雨时还漏雨。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

不堪的学校里上完了小学。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不少小伙伴没有读完小学就失学了，原因是家庭穷，刚刚能从事体力劳动，就帮助家人苦生活去了。我能读到小学毕业，真是万幸。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到离家十五里的一个叫沔西中学的学校去上学。学校里有食堂，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学生都吃不起食堂，而是自带干粮。我每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时，带上三天的干粮和一些咸菜，每顿饭是干粮加咸菜，喝些学校免费提供的开水。每星期三下课再回家取些干粮和咸菜，维持到星期六。因此，我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才能吃上真正的饭菜。当时的所谓干粮，绝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白面馍或白面饼，而是包谷面掺少许的白面所搞成的粗粮粑粑，既硬又难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学习的积极性却极为高涨。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像那些伟人那样，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处境。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对我讲：我们这样的农民家庭，要摆脱贫穷，只有好好上学，别无出路。因此，从小我就是个努力学习的好孩子。

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止上课。我这样一个比较贫穷的农村孩子，当然无有财力去弄革命，因而就回家帮助父亲挣工分养家。后来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也就在初中三年级时回到了家乡，成为了真正的农民。那个时候中国的“左”风盛行，生活极苦，我每天拼死累活，也只能挣到仅值7分钱的工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也真正体会到了“左”的东西的危害。如果说后来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很有自觉性的话，那么这段农村的艰辛经历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村越是苦，我就越自己发奋读书，幻想总有一天会考上大学。因此，在农村劳动时，读书仍是我的爱好和主要业余生活。

1970年9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农村又开始恢复高中学习制度，我又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所以我又上了高中。高中两年中，我

努力学习，指望着毕业后考大学。但当时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员制度，高中毕业后不可能直接考大学，所以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又做好了一辈子务农的准备，并且为自己购置了一套新的农具。但就在毕业前的两个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这件事几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西安市要求每个中学选送一名优秀学生到西安师专上学，毕业后充实到各中学任教，以解决各中学师资紧缺的问题。我因为学习优秀，就被我所在的学校推荐上师专学习，从而摆脱了高中毕业务农的命运。

到西安师专报道时，我因为极为厌烦当时的政治，因而报想学上一门类似数学或化学这样的业务课，以便能报效社会，自己也有碗饭吃，但没有想到给我分到了政治教育科学习。我几次找学校要求调专业，但均未有效，因而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当时学习的课程主要有两门：哲学、政治经济学。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才发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并不像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那种空头政治那样，而是一门学问，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对我认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极有帮助。就这样，我进入了后来要献身终生的经济学领域。

我进入西安师专学习的时间是1972年9月，当时正值中国处于“左”得发疯的年代，全国经济上极为紧张。我们每个学生的生活费为每月8元钱，每个学生的粮食定量为34斤，其中有40%为杂粮。因为生活费太少，所以我们只好吃“大锅饭”：每8个人为一桌，8个人共同吃一份饭。而且当时规定，若不在校吃饭，生活费及粮票作废，钱与粮票不发给本人。如此低的生活费和粮食供应，对我这样一个正在长身体的1.81米个子的小伙子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感到自己经常处于未饱肚子的境界之中。当时我最能吃饱的时候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因为同我一桌吃饭的西安市城内的学生都回家过周末了，我这一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来自农

村的同学因为距家太远，无力支付交通费而不回家留校，我们两个人吃8个人的饭菜。因此，当时虽然星期天不回家，但却很高兴，因为能吃饱肚子。这种一星期饥饿而星期天暴食的无规律生活，终于使我生了一场大病：肠梗阻。在手术时，因为为我手术的是工农兵学员的实习生，水平极低，结果造成伤口感染，以致使我身体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西安师专的学习生活虽然极为艰辛，但我却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读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名著，为我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两年艰辛的西安师专的学习生活于1974年7月结束，我因为学习优秀被分配到了西安市机关工作，为一位领导同志当秘书。后来因为我当秘书的领导同志调西安师专任职，所以我又调西安师专工作。在当秘书的生活中，我最大的乐趣是利用地位之便，能读许多经济学上的禁书，包括西安一些经济学名著。1975年9月我被下放锻炼到陕西省大荔县的一个黄河边的小村子中。在这个村子里，我有了更为充足的读书时间，读了许多经济学名著，并且对方圆几十里的村子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写出数十万字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四人帮”粉碎后，我又回到市级机关工作。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高考，并考取西北大学经济系。1978年2月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终于圆了我上大学的梦。但是入学三个月后，我就遇到了两个苦恼的问题：一个是大学所教的经济学的ABC知识，我早已学过，就连当时经济系作为经典的《资本论》，我也早已通读过，坐在教室听自己已掌握的东西实在难受。二是经济上遇到困难，因为当时规定凡工作五年以上的学员才能带工资上学，而我的工龄还差三个月才能带工资，所以我只能拿15元的生活补贴，生活无法维持。就在这时，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考取了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

炼成教授的研究生。

在随何教授学习的3年中,我完成了不少课题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尤其是同何教授对经济学的最基本范畴“价值”的研究,使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与何教授共同合著出版的《价值学说史》一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可以说,研究生三年,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上都极为不顺利。原因是:答辩委员会中有的人认为,我的硕士论文否定计划经济规律,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甚至主张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生产的要求而不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在1981年那种还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时候,这些竟是完全可以否定我的硕士论文。后来经过我对自己观点的反复论述,以及大部分答辩成员的努力,在我同意将我论文的一些部分删掉的条件下,终于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

1981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我留西北大学任教,担任何炼成先生的学术秘书,开始我多方面的研究,曾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并出过几本小册子。由于我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偏向宏观经济研究,因而西安这个古城就越来越难以满足我在研究上的条件。为了寻求新的有效研究环境,我于1984年10月报考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研究生,考取后于1985年2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进京后,我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天地。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中,在卫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不少引起社会关注的论文及论著,并于1987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东渡日本,在京都同志社大学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笹田友三郎、篠原总一教授进行合作研究。

1988年6月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时,参与了国家及有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咨询活动,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担任了河南省、陕西省、山东省等省市及十余家企业的经济顾问,中国体改研究会、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8个学术团体的理事或副会长,以及西北大学、河北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数次去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参加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二)

在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中,研究周期拉得最长的课题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从1978年9月发表第一篇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论文起,到现在已有15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过四本专著。由于我的研究倾向一直是强调市场化及市场的基础作用,因而在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较长时期里,我的观点经常受到批评,甚至因此而在评奖及晋升中受到影响。使我欣慰的是,我的观点后来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中央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应该也有我的一点贡献吧。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受到批评最多的恐怕要算有关国有经济的研究。像《真理的追求》这类杂志,就登了公开点名批评我的文章。就连有些直送中央常委的内部送审件中的文章,也公开点名批评。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仍然认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批评我的人主要是未搞清楚非国有化与非公有化的区别,非国有化不等于非公有化。我国在过去“左”的条件下,盲目地追求国有经济的规模,因而国有经济范围太大,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非国有化的问题,不要把非国有化同私有化等同起来。

我较早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及发展过程,形成一整套看法并出版了相应的专著,其中涉及主要问题以及基本观点是:(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兼容中,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是任何一方改变一方,而是使公有制及市场经济都以新的历史形态出现,使得公有制及市场经济都具有了新的形式。(二)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我认为,并存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并存,而是矛盾地并存,并且有竞争、有兼容、相互联合,因而会出现新的经济形式,如混合经济及作为其重要形式的新的股份制企业等。(三)关于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我认为,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是一个体制问题,即经济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要贯彻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并且要建立适合于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四)关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我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一个按劳分配机制与非按劳分配机制相互补充和相互矛盾的分配过程,必须建立新的收入分配体制,调节它们的关系,以求得分配活动的协调。根据上述认识,我写出了详细研究中国基本经济特征的专著:《建立公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新的所有制体制》、《建立新的收入分配体制》、《建立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

我积极主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规范化和细分化。我认为,宏观经济包括三个大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流量、宏观经济政策。我坚持按照这个体系进行研究,已先后出版三部专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失衡经济学导论》、《宏观经济政策学通论》。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一书中,我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体制作了系统的分析,论述了以间接控制为特征的宏观经济体制的内容构成,并对如何建立这种宏观经济体制提出了具体的

意见和措施。在《失衡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我对于宏观经济流量,即总供给和总需求,货币供应与需求、财政收支、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消费需求与消费供给等,作了系统的分析,并对流量在我国现存经济体制下的阻滞形式,即总需求膨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消费膨胀,投资膨胀等,作了深刻的探讨,提出了消除这些阻滞形式,保证宏观经济流量正常运行的体制措施和政策建议。在《宏观经济政策学通论》一书中,我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规定、内部构造、体系构成及作用取向和功能,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体制基础,决策模式,作用程序及实施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17种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我国利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

在对宏观经济做了细分化研究之后,我还对微观经济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认为微观经济研究的主要点有三:一是作为微观经济运行中枢的市场;二是作为微观经济运行供给主体的企业;三是作为微观经济运行需求主体的居民,因此,我按照这样的思路,相继完成了三本专著,这三本专著的题目为:《微观经济运行中枢——市场运行分析》,《微观经济运行供给主体——多重企业制度分析》,《微观经济运行需求主体——居民经济分析》。我的这三部专著,对微观经济运行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我认为,我国市场改革的目标是现代化市场,有调控市场与非均衡市场的统一,市场的充分放开将使我国体制朝着市场化的趋向发展,因而必须正确认识市场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对于企业问题,我提出了以产权为突破点的企业改革思想,主张我们要由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两权分离,走向所有权两个层次的分离,即:国家有最终所有权,企业有现实所有权,从而使所有权进入企业,充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居民经济的分析,我自认为我具有填补空白的功绩,把居民经济做为微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学界还不多见,而我则对居民经济做了系统的

分析,特别是提出了居民收入,居民储蓄,居民消费的有关重要规律。因此,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我具有独创的见解,并且使微观经济分析系统化。

我较早地涉足经济运行机制这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同他人合作的:《经济运行机制概论》、《市场结构与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发展和调节》等著作中,经济运行机制是指一定的经济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其功能。它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独立于经济本质规律而存在的事实,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难于摆脱的困境。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描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图景中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使我及其合作者受到启发。我们在《经济运行机制概论》一书中,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目标,企业经营机制,市场与市场机制,计划与计划机制的导向,社会生产比例的调节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作了科学阐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运行过程,从而为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理论的说明,令人耳目一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理论观点被广泛引用,1990年8月,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我的不少研究成果都是通过答记者问而公布于众的,大致上有120余篇答记者问。答记者问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经济形势分析及有关热点问题的探讨。我一直想出一本我答记者问的集子,但由于我平时不太收集我的答记者问的资料,有的收集到又送了需要用的人,因而到现在手头仅有的也不多。这次收集的仅十余篇。

在学术研究中,我历来主张学术自由。我认为只有学术自由,才能有学术的科学性与创造性。因而我提倡在学术研究中,学者研究宜自重,学术研究的保障要法制化。就这个问题,我曾接受过《学

习》杂志记者的采访,现将这个采访原文分录于后,做为我的自述的结束语:

学者宜自重 保障要法制

如何保障学术自由,这既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

从国家方面讲,首先要正确处理学术研究成果与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法律范围内当一些超前的学术成果与现行政策相矛盾时,国家的做法就直接关系到能否保障学术自由的问题。我认为国家应允许并且要保护这种具有超前性的研究成果的存在。不要简单地采取“管、卡、压”的办法,更不要盲目地去批判。而是要给予一个充分地自由论争的过程,让实践来检验它们的正确与否。

其次,国家担当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判人,容易对自己权威性造成威胁。政府可以选择理论,采纳某些研究成果。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如果政府直接参与评判学术研究的对与错,往往事与愿违,不但不能保障学术自由,反而在某些时候令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再者,国家应处理好学术研究系统与宣传系统的关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客观规律,学术研究的任务是不断地探索、认识规律;而宣传系统是为了宣传党的现行政策,它的宣传可能有正确不正确之分,但在受现行政策约束这点上,是无可置疑的。可见学术研究与宣传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从广义上说,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也是一种宣传,但与宣传现行政策毕竟是两回事。所以不能用宣传现行政策的方式来要求、领导学术研究。

第四,不要简单地把学术研究的具体成果同对学者自身的评价联系起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具体成果如一篇文

章,往往只代表一定的理论观点,并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研究水平。对于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评定,应由相应学术领域的持客观、公正态度的学术权威人士组成的机构负责。如果仅仅出于非学术的宣传需要,就简单地将一项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学者自身地位的升迁、评奖、职称评定等挂钩,那么用“升迁”等手段来支持一种学术观点,势必会导致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跟着走,而且是违心地走,这一走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也就跟着一起丧失了。

对于学术界而言,为使学术自由受保障,也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转变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敌情观念”。有些学者把社会科学领域内正常的学术争鸣简单地划归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同志视为阶级意义上的敌对方。意识形态领域并非没有斗争,但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是分得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持不同的学术观点,就是持不同政见,仿佛学术界到处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因此也就产生了只要学者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都会被先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不正常现象。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泛化观念是要彻底改变的。否则它将阻碍正常的学术交流与争鸣。

第二,学者千万不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视为“永恒真理”,处处以“老大”自居。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客观规律,但研究成果并非一成不变的。由于人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片面性,所以才需要不断地探索客观规律。这就要求学者要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要有一种“去伪存真”的精神。

第三,要处理好学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学者是靠自己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立于世的。学术成果是否具有真理性,要靠实践检验;学术成果是否具有权威性,主要视它是否具有真理性,如果有则能服人。如果借助行政力量来树立自己学术观点,打击不同观点,甚至

打倒另一批学者,那就不是一个探求真理的学者的所作所为了。学术争鸣应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学者之间应努力形成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文人斗文人、文人自相摧残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如何保障学术自由,除上述谈的几方面外,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把保障学术自由制度化,制订一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者才可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学术自由度的大小只能取决于人治的开明与否,宽容与否,那么保障学术自由还是停留在纸上。

原载《学习》杂志 1993 年第 1 期

目 录

自述：人生与学问	(1)
----------------	-----

第一部分 国有经济研究

民营经济是基础 国有经济是主导	(3)
论国有制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	(6)
在搞活企业问题上思想再解放一点	(18)
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体制改革	(22)
关于国有经济改革的两个问题	(32)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体制改革	(35)
全面改革国有制经济体制	(47)
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负担问题	(51)

第二部分 收入分配研究

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双层次收入分配体制	(57)
分配机制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调控	(74)

分配机制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 (88)

第三部分 市场经济研究

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趋向..... (103)

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思考..... (107)

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112)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131)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 (144)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改革政府体制..... (156)

7
小
7
小

第四部分 形势与热点问题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变动趋向分析..... (167)

千方百计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179)

改革的步子迈得再大一点..... (182)

大陆今年后两个月及明年经济走势..... (189)

谈“回扣”..... (193)

怎样认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197)

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及走势..... (203)

关于腐败的断想..... (207)

市场经济与历史包袱..... (211)

经济改革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15)

银行不是“保姆” 居民不是“雷锋”

——居民、银行、国有企业的信用关系分析..... (220)

谈我国融资方式的选择..... (223)

要保障居民的投资权益..... (227)